

# 抗戰時期史語所學術群體治史理念的轉變\*

張 峰

---

**[提 要]** 史語所學術群體以歷史考證著稱，故長期以來被不少學者誤以為他們安於學問的象牙塔，不關心現實問題和民族命運。實際上，當“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他們為保存學術命脈，歷經所址播遷，在民族危難的境遇中開創了現代中國學術研究的新典範。從政治變局與學術研究的互動中，折射出史語所學術群體治史理念的轉變，即治學取向由求真轉向致用，並力圖在求真與致用之間探尋最佳的結合點。這主要表現在，他們不僅於抗戰時期直接向國民政府發出抗日的吶喊，表達對於民族命運的憂心，而且通過寓愛國思想於實證研究的方式，彰顯他們對歷史上重大問題的看法和對國家前途的關切。

**[關鍵詞]** 抗戰時期 史語所學術群體 實證研究 愛國思想 現代中國史學

**[中圖分類號]** K0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3 - 0105 - 08

---

成立於 1928 年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與現代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密切牽涉，這也註定了它在這個多事之秋中的乖舛命運。尤其是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史語所學術群體力排眾難，慘澹經營，在歷史、語言、考古等諸多學術研究領域均取得重大成就，不僅改寫了近代以來中國學術處處落後於國外的局面，而且在國際學術界構建了自身的話語體系。在政治環境與學術研究的互動中，映射出史語所學術群體在治史理念上超越了單純考證的尺度，轉而將歷史研究與現實需求相結合，將求真與致用相融通，從而開創了學術研究的新境界。

## 一、為保存學術命脈而歷經播遷

史語所的學術命運與時代環境的變遷休戚相關。自“九一八事變”起至 1945 年中國政府取得全面抗戰勝利期間，史語所的發展路徑一直受到日軍侵略的影響。然而，史語所學術群體並未因此解散，恰恰相反，他們抱定書生救國“唯期貢其一得”<sup>①</sup>的學術信念，自覺保存中華學術命脈，

---

\* 本文係 2015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外史學交流視野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範式與成就探析”（項目號：15CZS002）的階段性成果。

戮力前行，書寫了現代中國學術史的華麗篇章。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史語所共歷三次所址遷徙。1929年6月，史語所由廣州遷至北平。此後，各項研究工作有序展開，史料整理、方言調查、考古發掘及儀器、圖書購置等項漸具規模。1933年3月，史語所第二、三兩組臨時遷入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翌年10月，又遷至南京雞鳴寺路史語所新址，而原來留在北平的史語所第一組學人及圖書、史料、公物等，亦因日軍對華北的侵凌而於1935年11月悉數被遷至南京史語所新址。<sup>①</sup>

史語所遷徙的背後，折射出日軍侵略對其發展的掣肘。傅斯年在史語所1931年度工作報告中說：“適瀋陽事變起，本所經費即未能按預算領到。關於購置設備方面，不免略有停頓。”<sup>②</sup>其實，“九一八事變”對史語所的影響遠非停購設備那麼簡單，最主要的還是它限制了史語所各項工作的開展。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檔案中珍藏著該所1931年度下屆第一次所務會議的記錄，其中言及史語所因受戰事影響而導致經費開銷嚴重不足，以至不得不將第一組正在開展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暫行縮小範圍”，“以期節省”。<sup>③</sup>隨著日軍侵華勢力的深入，傅斯年深感維持史語所運作之艱難，這在他1933年2月26日寫給趙元任的一封信中表達得淋漓盡致：“上海戰起，弟以為研究所生存之希望十之一耳，故不得已想了好些節省的辦法，蓋當時知十一、十二兩個月分文未領，一月一成而已。如此是真辦不下去的。同時院中來電來信，令以撙節、緊縮，等等者，不計其數，研究所尚有今天，非當時所能料及也。在這些計劃中，二組移居亦是一個，然此並非大的，即如我之別求生路，亦是一個，亦不是大的。其最大者是，‘在萬不得已時，一、二組減至每組一位研究員，考古組可以不動，因為沒有許多薪水，或者第一組全部取消亦可，因為考古也是歷史，無論如何，我自己當然是走的，如此，以濟之（指李濟，引者）負責，由中基會月出三千元光景。’”<sup>④</sup>如此看來，日軍侵略已經關涉到了史語所的生死存亡。但即便如此，史語所各組工作“仍得以賡續邁進”。<sup>⑤</sup>至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史語所於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明實錄》校勘、安陽殷墟考古發掘以及語言調查等各項工作均取得了令人嘆服的成就。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敵機不斷來京轟炸”，<sup>⑥</sup>史語所為了維繫既存研究成果和學術研究的統緒，決定將全所人員內遷。隨著戰事的擴大，史語所各組開始將善本圖書與重要儀器、標本裝箱，一部分經李濟督運，保存在江西南昌省立農學院，一部分隨史語所遷至湖南長沙韭菜園聖經學校。當月22日，助理員芮逸夫率先抵達湖南，開始料理一切。在之後的兩個多月裡，史語所學人陸續遷往長沙聖經學校。董作賓在抵達長沙後曾致函傅斯年，從一個遷徙者的角度敘述了所址播遷給整個史語所帶來的種種困難：

白費了半個月的光陰，今天才把一個漂泊的家安插，有一張桌子可以寫信了。由思永兄那裡借讀大示，深感吾兄維持大局之苦心。一切，弟當努力協助諸公刻勵進行，至少，自己是不敢貪圖苟安的。前日南昌消息不好，同仁極焦灼。及電詢，始知存件安全。弟等私計，擬派人前往照料，或者運湘，但均非易；因移動須有院中文件，往返需時，又運費浩大，恐此間存款不便動用。南昌存件之移動與否？或更謀安全辦法，一切，思永兄當有函奉商也。

運箱之船，一再拖延，今日仍未到，又推云明日可達。計二、三批均由此船（湘潭）裝來，來即分別存入地下室也。

關於本院本所工作，此時尚有所待。一、需待平大聯合辦公處來人商量分配房子各事。二、房子分配後，各所工作室再為分配。三、始能計及應作之工作。日來有本院或一

部分遷南嶽之說，弟與思永兄覺無論如何，本所不便遷往；即本所他組可遷，三組必不可遷，因吾等材料太多，搬運費錢，且亦難保較長沙為安全耳。一、兩日內必有各項決定，容即另函詳陳。

濟之兄在京否？為言巽翁老伯暨其家人安健。此間無眷屬者較易安插，皆住聖經校宿舍，有眷者租房頗不易，朱經農夫婦為此頗費工夫。現弟覓得城內瀏正街七七號樓下三間，尚可暫居，押金百卅元，行租月十三元。思永、元任、濟之太太皆已租定房子，同人多已安定。惟勞榦君此來同行，因負擔太重，不勝其苦（其家大小七口吃飯），弟一路目睹，然亦愛莫能助耳。

長沙屋多卑濕，不宜久居。所幸者，雖曾有警報三次，皆未果來。如此苟安旦夕，能將安陽報告粗成梗概，亦可稍盡一點自己之責任也。第三組工作之分配，乃安陽報告編制辦法，日內有所擬定，即當奉聞。弟所租之斗室，已擺開書攤子，且先理未完成之一部分稿件（第五期祀典之未完稿）耳。<sup>④</sup>

此函傳遞出史語所學人在生活苟安旦夕的境遇中，首先考慮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史語所的存件安全與否、安陽殷墟發掘報告的編制辦法以及個人文稿的撰述問題，由此反映出史語所學術群體學術研究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儘管史語所學人受盡遷徙之苦，不願將所址再次變動，但因南京戰事失利，中研院無奈只能再度西遷，史語所也根據 1937 年年底院務會議所定原則，決定將所址內遷雲南昆明。遷徙工作從是年 12 月起，持續至 1938 年 4 月，長達 5 個月之久，其間原因在於戰亂頻仍、交通阻斷；加之史語所人員眾多，遷徙較緩；圖書、儀器等物數量之巨，更為遷徙帶來不便，因而使得整個遷徙工作異常艱辛。在遷徙過程中，凡不能隨史語所遷徙的員工，予以疏散解職；隨遷的人員，亦要分擔押運公物遷往昆明。然而，遷往雲南之後不久，昆明即陷入敵機的轟炸之中。傅斯年考慮到史語所同人的安全問題，乃決定將所址遷徙至昆明城北十一公里處的龍泉鎮棕皮營村。同時，保留昆明殿花巷房舍作為城內辦事處。至 1940 年，滇邊軍事吃緊，史語所不得不再次考慮所址的遷移。6 月 20 日，史語所召開臨時所務會議，討論了所址遷徙方案，於是年 9 月確定遷至四川南溪縣李莊西約六里的板粟坳張家大院。史語所學術群體在四川李莊度過了六個春秋，直至 1946 年 11 月方遷回南京雞鳴寺路原址。

史語所在抗戰時期屢經遷徙，研究人員飽受戰爭的摧殘，然而，他們堅定秉持學術報國的理念，在艱難的生活環境中仍然創造了輝煌的學術成就，譬如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證》、董作賓的《殷曆譜》、勞榦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部分》與《居延漢簡考釋·考證部分》、全漢昇的《唐宋帝國與運河》等大批影響至今的學術名著，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並出版的；同時，史語所還編輯出版了《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第八本、第十一本，出版《史料與史學》（上下冊），石印出版《六同別錄》上、中兩冊等刊物。史語所學術群體創造的這些學術精品，直至今日仍為學界稱道。由此可見，作為一個現代學術社群，史語所雖經戰火的淬礪，卻依然堅如磐石，矢志不移地以發展中國學術文化為職志，於曲折的發展中創造了傑出的成就，同時形塑了史語所的學術精神。

## 二、時代變局與民族關懷

以往對於史語所學術群體的評價，多認為他們在民族危難時刻不顧民族大義，仍然鑽在故紙

堆中從事繁瑣而無意義的歷史考證工作。實際上，時代變局對史語所學術群體的治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一向反對史學致用的傅斯年，治學路徑與旨趣經歷了由求真向致用的轉變。從今天的認識來看，我們只有對史語所學術群體在當時政治生態中的言論與實踐作出較為全面的考察，才能對其學術思想作出合乎時代意義的闡發。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社會各界譁然震驚，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學術救國熱情高漲。以實證研究聞名的史語所亦未置身於時局之外。史語所學術群體處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治學取向由求真轉向致用，力圖在求真與致用之間探尋最佳的結合點。

作為史語所的掌門人，傅斯年本欲將史語所建成一個純粹的學術研究機構，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卻打破了他為史語所預設的發展道路。當日本佔據東北後，史語所學人悲憤不已，於9月22日聯名致電中研院院長蔡元培及總幹事楊銜：

此次當局在昏門甜夢中，坐失遼東萬里，懇先生在中央提議，自己振作，方可博得世界之同情，向外流血，方可集全國為一致，所謂無抵抗主義者，自失人格，誰來拯救，寧可將事件擴大，引起世界戰爭，不可以持重之藉口，為自己之地位財產作和圖，今日之局，不戰則降，幸先生有以對國人也。<sup>⑨</sup>

事隔兩月，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史語所學人再次致電蔡元培，表達他們對於民族國家的憂心和懇請當局“共禦外侮”的迫切願望。<sup>⑩</sup>

書生報國無外乎以文字表達他們的內心情感。為了回應、批判日本學者所謂“滿蒙非中國領土”的論調，史語所學術群體積極策劃編纂一部《中國通史》，<sup>⑪</sup>從學理上論證東北自古便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傅斯年等人有關《東北通史》的編纂計劃，便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其時，傅斯年心急如焚，“多日不能安眠”，甚至後悔曾經選擇史學作為志業而“無以報國”。<sup>⑫</sup>他認為，書生救國的當務之急是趕在國聯調查團到達中國之前，於十日之內完成《東北史略》的編纂，並“翻成英文”。<sup>⑬</sup>因此，他召集徐中舒、方壯猷、蕭一山、蔣廷黻等人分頭編撰，並作了具體分工：（一）傅斯年負責古代之東北部分；（二）方壯猷負責隋至元末之東北部分；（三）徐中舒負責明清時期東北部分；（四）蕭一山負責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五）蔣廷黻負責東北之外交部分。<sup>⑭</sup>因時間倉促，僅傅斯年撰寫的古代東北部分於同年10月出版，名曰《東北史綱》。傅斯年在1932年3月20日致顧維鈞的書信中強調，他編纂此書的旨趣“在於證明三千年中滿洲幾永為中國領土，日人所謂‘滿洲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實妄說也”。<sup>⑮</sup>所以，在《東北史綱》中，傅氏開宗明義地指出，“滿洲一詞，本非地名”，“日本及西洋人之圖籍中，稱東三省曰‘滿洲’，此一錯誤，至為淺顯，而致此錯誤之用心則至深”。尤其是“南滿”“北滿”“東蒙”等地理名稱，傅斯年認為是日本人“為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據”。<sup>⑯</sup>故而他用了不少筆墨來論證《東北史綱》之用“東北”而不用“滿洲”的理由，目的是“先從源頭上解決東北不稱滿洲的問題，進一步則指責日本學者的立論無所本”。<sup>⑰</sup>對於傅斯年的良苦用心，有些學者很不理解，專從史實上考究《東北史綱》之不足。繆鳳林評價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並指出，傅斯年的《東北史綱》與日本人白鳥庫吉等二十年前所著《滿洲歷史地理》相比，後者“雖亦間有缺誤而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實遠不如《東北史綱》之多，此則吾人所認為史學界之不幸者也”。<sup>⑱</sup>相對來說，鄭鶴聲對傅斯年《東北史綱》的評價，則顯得公允而較溫和：“傅君等之著《東北史綱》，實所以應付東北事變，不免有臨渴掘井之嫌。然臨渴掘井，猶勝於緣木求魚。”儘管他認為傅著

也存在名實乖異、斷限之失、史料遺漏及錯訛等不足，但又認為“剪裁議論頗有獨到之處，求之於吾國學者著述之東北史書中，尚屬少見，洵足以破日人之妄說，而感世人之興會”。<sup>⑩</sup>這是從史學求真與致用兩個層面，對傅斯年《東北史綱》作出了較為符合實際的評價，因而其見解值得珍視。

傅斯年不僅從學理上對日本學者有關“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謬說進行駁斥，而且與胡適、蔣廷黻等人共辦《獨立評論》，對日本的侵略野心進行揭露，對當局的麻木不仁進行批判，希冀喚起中國民眾的抗日熱情。他指出，“九一八事變”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sup>⑪</sup>但日本人並不以此滿足，還要進一步侵佔熱河與平津，所以他提醒中國人民放棄和平解決的“甜夢”，因為“日本人的行動，及其外交口號，既已如此明明白白表示對中國取宰割的政策”。故而，傅斯年主張對日本採取持久抗戰的方略，“中國雖不能打勝日本，卻可以長久支持，支持愈久與我們越有利”；並建議將當時華北的軍事、財政“徹底佈置”，“以便成立長久的有效的抵抗”。同時，他大聲疾呼“歷史告我們，中華不是個可以滅亡的民族；事實告我們，倭人不是一個能成大器的國家”，以鼓舞民眾抗戰的士氣。<sup>⑫</sup>這些見諸於報刊的文字，均表達了他濃郁的民族情懷與強烈的愛國思想。

在當時，日本侵略者的殘酷暴行刺痛著每一位史語所學人的內心，他們無法靜心於書齋，思忖著為抗日作出自己的貢獻。王崇武在其《自傳》中寫道：“抗日軍興，我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服務。隨所西遷，輾轉流離……。那時，一方面憤恨日寇的兇暴，一方面又目擊國民黨之無能，胸懷抑鬱，無可發洩，只有靠讀書來排遣。”<sup>⑬</sup>史語所考古組的劉燿（後易名尹達）因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不能容忍，毅然於1937年離開了他心儀的考古事業，奔赴延安，參與抗戰。從1931年春季起，劉燿便以河南大學實習生的身份參與殷墟的考古發掘，以後又考入該所研究生，畢業後留所工作。在史語所七年，他曾參與了河南安陽大賚店、後崗、西北崗、浚縣辛村與山東日照兩城鎮等遺址的調查與發掘，其考古實踐受到梁思永、董作賓的賞識。李濟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說梁、董二人對於劉燿的工作“均極贊許”。<sup>⑭</sup>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他斷然決定投筆從戎，奔赴抗戰前線。他不顧史語所考古組同人的挽留，認為“此時國將不國，何學術為！抗日第一，愛國為先”，<sup>⑮</sup>遂於1937年底奔赴延安。陳述在史語所中從事遼金史研究，亦旨在“以紙墨報國”。<sup>⑯</sup>

可見，史語所本係一個純粹的學術研究機構，但在民族危難之際，該所學人無不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或為此奔走呼號，或棄筆從戎，或靠讀書來排洩心中的憤懣。然而，更多的學者，還是將他們對民族與國家的關切及對日本侵略者的鞭撻融入到學術研究之中。

### 三、學術研究與愛國思想

“九一八事變”及“七七事變”，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兩次驚雷，將中華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風口浪尖。當時大批知識分子採用了多種學術救國的方式，除了口誅筆伐日本的侵略行徑之外，也重視對中國歷史地理進行深入研究，進而喚起民眾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於此方面，顧頡剛等人所創辦的禹貢學會及出版之《禹貢》雜誌，走在了學術研究的前沿，既回應了抗日戰爭的時代主題，又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顧頡剛在1935年致函傅斯年說：

弟所以創辦禹貢學會，發行《禹貢》半月刊，即是你們編《東北史綱》的擴大，希望興起讀者們收復故土的觀念，為民族主義的鼓吹打一堅實的基礎。……我們這學會，研究各時代的地理沿革的都有人了。將來畫出地理沿革圖來，決不會像日本人的亂抄楊

守敬圖，而可對於楊圖作訂正的工作了。在民族史方面，研究滿、蒙、回、藏的也都有人，固然起始不會有很好的成績，但只要這個會能夠維持下去，也必有相當的收穫。這兩件事情做得好，我們這輩唸書人總算對於我們的國家民族有了相當的貢獻，不必以“緩急無所濟”自愧了。<sup>⑩</sup>

可見，顧頡剛所創辦的禹貢學會和編纂的《禹貢》雜誌與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後所撰著的《東北史綱》，前後呼應，有著共同的學術旨趣與政治意蘊。

同樣，史語所學術群體在二十世紀 40 年代也從事了相關的歷史地理研究，編纂了《中國疆域沿革史》。史語所學人書生報國心切，為協助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加強工作以助國際宣傳”<sup>⑪</sup>，承擔了“中國疆域沿革史”課題的編纂任務。此書之編纂，為史語所集眾研究項目之一，具體分工是：漢代部分由副研究員勞榦擔任，隋唐部分由專任研究員岑仲勉擔任，明代部分由副研究員王崇武擔任，清代部分由南開大學借調至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楊志玖擔任。從史語所 1945 年度的工作報告來看，該書編纂已全部完成。<sup>⑫</sup>但筆者於“史語所檔案”中僅見勞榦所撰漢代部分 1 冊、岑仲勉所撰隋唐部分 2 冊及楊志玖所撰清代部分 3 冊，並未見到有關王崇武所撰部分。在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之“王崇武檔案”以及王氏所出版的著作中，亦未曾見有相關內容。但無論該書有無最終撰成，由此已不難看出史語所學術群體的愛國情懷與編纂是書的旨趣所在。

就個人的研究而言，在全國處於抗戰的時代背景下，史語所學術群體的研究內容無疑緊扣時代脈搏，與當時的政治格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陳寅恪對於現實的關懷、對於國家的熱愛，表現在多個方面。抗日戰爭時期，陳氏旅居香港。1941 年底，香港淪陷，身處其地的陳寅恪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當時，日本人以港幣四十萬元請其創辦東方文化研究院，被陳氏嚴詞拒絕；後陳氏舊時的學生力勸他到當時淪陷區的上海或廣州任教，陳寅恪因不肯為日寇服務，而設法逃離了香港。<sup>⑬</sup>他在後來致友人書中說：“汪偽之誘迫，陳璧君之兇惡，北平‘北京大學’之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托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均已拒絕”。<sup>⑭</sup>儘管當時他在經濟上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但絕不為五斗米折腰，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抗戰勝利後，陳寅恪悲喜交加，賦詩曰：“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國仇已雪南征恥，家祭難忘北定時。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sup>⑮</sup>表達了他當時的內心世界。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門唯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種精神不僅貫穿於他的現實生活中，而且在學術著作中也有著鮮明的體現，“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sup>⑯</sup>尤其是，陳寅恪在抗戰時期完成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專列一章討論“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看似在講唐朝史事，實則是在借古說今。他通過對歷史上突厥、回紇、吐蕃、南詔等民族的盛衰與唐皇朝興亡關係的考察，藉以闡明外族對唐朝的侵略最終導致其滅亡。反觀這一時代背景，陳寅恪作此研究的深層意旨，在於說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必特為標出之，以期近真實而供鑑誡，兼見其有以異乎誇誣之宣傳文字也”。<sup>⑰</sup>可見，陳寅恪是通過對古史的考證研究，以古喻今，隱含地指出日本侵略與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係。他希冀通過歷史研究，從而為現實政治提供“鑑誡”。這是陳寅恪將愛國思想、歷史借鑒意識與古史考證寓於一體，由此發揮史學經世致用功能的集中體現。

抗日戰爭時期，岑仲勉所發表的考證之作，表面看來幾乎全是純學術性的文字，實際上，岑

仲勉的學術研究自始至終灌注著濃厚的時代色彩，從中不難看出他的愛國情懷。青年時代的岑仲勉便自覺追求新知，深受《清議報》、《新民叢報》、《浙江潮》等介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和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刊物的影響。他為了擁護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曾親自參與倒袁鬥爭。抗戰爆發後，史語所因寓居四川李莊而對於外界消息瞭解甚少，史語所學人多以讀書排解心中的苦悶，儘管岑仲勉於此時主要從事歷史考證研究，但卻有著鮮明的現實關懷與經世思想，對當時的戰事與時局表現出異常的關心。在“傅斯年檔案”中，筆者發現了岑仲勉囑買的一份書單，其中有《美國內幕》、《太平洋戰爭》第一輯、《時事新報》等書刊。<sup>④</sup>這足以說明岑氏對現實政治的發展有著深切關懷。只是，這種對於現實的關懷在其歷史考證之作中有著更加隱喻的表達。

“九一八事變”起，岑仲勉對日軍侵襲給廣東民眾帶來的騷動，深有察舉。在此背景下，他撰寫了《明代廣東倭寇記》，以時間為序對明代廣東的倭寇侵擾進行輯佚與考證，尤為重視對明代倭寇侵略行徑的揭露與批判，以及對抗倭將領的英勇事蹟進行表彰。岑氏期冀通過對明代廣東倭寇史事的總結，使“吾邦人持以鎮靜，毋庸人自擾，蹈明世覆轍”，應樹立抗敵必勝的信心，“夫日之未來也，密備之，其來也，力拒之，眾志成城，豈刀兵水火所能克？”<sup>⑤</sup>1936年綏遠會戰爆發，而此地正是唐相李德裕討平回紇之地。岑仲勉有感於此，寫道：

夫唐之把頭烽，今之包頭也，唐之綏遠烽，今綏遠所溯名也。斯二地者，都與公（引者按：指李德裕）討平回紇有關，緬國步之方艱，能無頌前勳而懷想也哉。<sup>⑥</sup>

故岑仲勉將李德裕會昌年間征伐回紇等有關言論、文字從史傳文集中輯出，並加以整理、考證，使之“本末具見”，以從中“觀其應付策略”，“為後人鑒法”。<sup>⑦</sup>又如，他在1945年所撰的《唐唐臨〈冥報記〉之復原》一文中，開首便提到1939年於雲南完成了《〈兩京新記〉卷三殘卷復原》一文，“奈當時或誤信滬上之安全，不悟敵人之陰險，遂而淪陷，然前赴後繼，乃克獲最後之勝利，茲篇之作，寓意於是”。<sup>⑧</sup>岑仲勉的這些篇章，雖仍是考證之作，但卻將作者的愛國思想蘊涵其間，“表達了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嚴正聲討，以及侵略者必亡的識見”，<sup>⑨</sup>有助於我們從多維視野考察史語所學術群體在抗戰時期治史理念的轉變。

綜上所述，無論是史語所的集眾研究，還是個人研究，其治史理念均與時代變化有所關聯，甚至激發他們從現實的困境中去反思歷史問題，從而為現實社會服務。如全漢昇因戰時通貨膨脹的現狀，而注意到貨幣和物價的變動問題，不料三十歲出頭的經驗與體會卻成為他畢生心血所經營的課題。<sup>⑩</sup>從中仍可以看出，史語所學術群體的學術研究並未脫離現實，在他們的學術著作中蘊涵著對於歷史重大問題的解釋和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以及對於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

① 史語所檔案，李13-8-1。原件藏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② 王懋勤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事年表》，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紀念特刊》，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年，第8頁。

③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年度報告》，

載《傅斯年全集》（六），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7頁。

④ 史語所檔案，雜23-2-5。

⑤ 史語所檔案，元490-18。

⑥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報告》，載《傅斯年全集》（六），第377頁。

⑦ 《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年度報告》，

載《傅斯年全集》(六),第535頁。

⑧史語所檔案,補29-32。

⑨⑩王懋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史資料初稿》(手稿),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9年,第60頁。

⑪陶希聖說:“民國二十年,孟真在北平,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同時主持北京大學史學系。我到北京大學教書,九一八事件發生,北平圖書館開了一個會,孟真和我都在座。他慷慨陳詞,提出一個問題:‘書生何以報國?’大家討論的結果之一,是編一部《中國通史》;此後北大史學系即以這一事業為己任。”參見陶希聖:《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23日。

⑫傅斯年:《致王獻唐》(1931年10月6日),載《傅斯年全集》(七),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3頁。

⑬史語所檔案,元567-10。

⑭⑯傅斯年:《東北史綱》,載《傅斯年全集》(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3、376頁。

⑰史語所檔案,元372-4。

⑱彭明輝:《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以考據與經世為主軸的討論(1919—1949)》,載魏格林、施耐德編:《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9年,第269頁。

⑲繆鳳林:《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南京:《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第1卷第2期,1934年。

⑳鄭鶴聲:《傅斯年等編著東北史綱初稿》,南京:《圖書評論》,第1卷第11期,1933年。

㉑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載《傅斯年全集》(四),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㉒傅斯年:《日寇與熱河平津》,載《傅斯年全集》(四),第29頁。

㉓張德信:《王崇武》,載劉啟林主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名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476頁。

㉔史語所檔案,元208-4。

㉕石璋如:《劉耀先生考古的五大貢獻》,載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1998年,第661頁。

㉖陳述:《遼史補注·後記》,載《遼金史論集》(第五輯),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1頁。

㉗顧頡剛:《致傅斯年》(1935年10月23日),載《顧頡剛書信集》(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11頁。

㉘史語所檔案,李69-1-4。

㉙史語所檔案,李65-9。

㉚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1942年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0頁。

㉛陳寅恪:《致傅斯年》(1942年6月19日),《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85頁。

㉜陳寅恪:《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陳寅恪集·詩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49頁。

㉝季羨林:《回憶陳寅恪先生》,載張傑、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28頁。

㉞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22頁。

㉟史語所檔案,李10-16-17。

㊱岑仲勉:《明代廣東倭寇記》,廣州:《聖心》,1932年第1期。

㊲㊳岑仲勉:《李德裕〈會昌伐叛集〉編證(上)》,廣州:《中山大學史學專刊》,第2卷第1期,1937年。

㊴岑仲勉:《唐唐臨〈冥報記〉之復原》,南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1948年。

㊵姜伯勤:《岑仲勉》,載陳清泉等編:《中國史學家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20~1321頁。

㊶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台北:《古今論衡》,1998年第1期。

作者簡介:張峰,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博士。西安 710069

[責任編輯 陳志雄]